

农村劳动者流动中的几个问题^{*}

黄 平 彭 柯

【摘 要】 在中国现有的研究和相关的政策建议中,流动常常都被看做是缓解乡村“剩余”人口(劳动者)压力的一种方法,也是实现现代化的一种主要手段。换句话说,乡村被看做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之一,它带来的更多是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作者提出,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应该更多地考虑农村外出劳动者对于流出地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 劳动者流动 城乡一体化 非农就业

【作 者】 黄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彭 柯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

一、劳动者的流动对于贫困和全面发展的影响

(一) 对于贫困农村社区居民的影响

庞大的农村人口和有限的耕地资源是中国过去和未来发展的最严重的制约条件之一(温铁军,2000)。不过,近些年来城乡之间的劳动者流动^①已经部分缓解了人口增长和耕地不足之间的紧张状况。到2000年底,大约有至少8000万农村劳动者在城镇地区工作。一些早期的研究显示,随着农村劳动者的流动,耕地和劳动者的比例在家庭和村庄层面实际提高了1/3以上(黄平等,1997)。

尽管无论是从比例还是从绝对数来看,非农产业中农村劳动者的数量都越来越多,但是外出务工和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村劳动者,其实主要是农村人口中第一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因此,尽管出现了大规模的城乡之间的劳动者流动,农业生产中总的劳动者并没有真正减少。也就是说,尽管有农村劳动者外出务工,土地承受的压力也还是增加了。白南生认为,短期或中期的劳动者流动对于减轻土地的压力没有真正的贡献,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年轻的人口结构,就更是如此。尽管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到2030年中国人口也将上升到15亿左右(Bai, 2001)。

年轻的农村外出劳动者对于提高乡村生活水平的确做出了贡献。他们常常按月或按季

* 本文是提交给2003年6月22~24日在达卡举行的“亚洲迁移、发展和偏向穷人政策选择”国际会议的论文的一部分,占少华为本文的资料收集和写作做了大量辅助工作;原文是英文,译者马春华;白南生、蔡昉、温铁军、赵树凯、朱宇等对本文提出过很多批评和建议,谨在此一并致谢。

① 在本文中,migration主要被翻译为“流动”,这既与作者的原意更吻合,也与国内近年来的研究用语一致。因此,laborer migraton被译做了“劳动者流动”(我们不愿意使用“劳动力”来指称这些活生生的行动者),主要指的是农村劳动者自主的变动,劳动者离开了自己的村庄,到城镇(包括乡镇、县和省内或者省外的其他小城市,也包括省会城市和大都市)中寻找非农就业的机会,其中既有临时性的也有季节性的(1年至少外出3个月以上),有时甚至和其他家庭成员一起外出。无疑,“流动”本身实际上也包括城市之间和乡村之间的移动,甚至一定程度上的从城市到农村的移动,这些也会在本文适当的地方被提及。

度把收入寄回家,最坏的情况下也要按年资助家里的开销和生活。这些汇款大部分都用于日常开支,为许多贫困家庭和农村社区的生存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例如,1990年中期四川省的一个贫困县,县邮局每年收到的汇款可以高达县财政收入的几倍。通过邮局寄回的汇款仅是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带回家的一部分,其他的是春节或秋收时带回家,这些甚至不比邮局汇款少(黄平等,1997)。

然而,如果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劳动者流动对于当地农村发展产生直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那还为时过早,尽管许多输出地目前正在制定各种政策促使这种现象的出现,但流动的农村劳动者寄回的汇款,大部分被用于家庭消费和日常开支,包括修建、粉刷新房,婚礼和葬礼等。许多农村年轻人在婚礼、生日宴会和家庭装修等方面以城市为标准,甚至一些没有外出务工或者经商经历的人也学这种风尚。这些都改变了农村的礼仪,以及其他的社会活动形式。特别是年轻人,他们认为城市的生活和生活方式比传统的更加富有吸引力(Huang,2000)。

为了过上城市生活,许多来自农村的年轻劳动者并不在意工作时间长、艰苦而且危险,一般都没有签定正规的合同,特别是在过去10年中,甚至到春节还不一定能拿足一年的工资(蔡昉,2001)。

现金收入总是很重要的,特别是近年来,年轻的农村外出劳动者父母的医疗费迅速增加,弟妹们的教育费用也提高得很快,而许多当地的农村政府面临财政困难,公共医疗和基础教育经常既资金不足也缺乏制度支撑。

公共医疗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近些年来,中国农村的医疗成为严重的问题。当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增长变慢时,农民的医疗支出却迅速增加。在许多农村地区,医疗和预防是分开管理的,而且前者有日益商业化趋势。这使得农村的公共医疗和保健问题更加恶化。许多农民无法支付村(乡)诊所的治疗费用,更不用说县城里的医院,那里费用更加昂贵,而且在远离村庄的地方。治病使许多农户负债累累,甚至出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一般来说,只有在外务工子女的汇款才能使父母支付日益昂贵的医疗费用。

(二) 对于城乡发展的贡献

根据一份研究报告,城乡之间的劳动者流动大概解释了过去18年来中国GDP增长的16%。劳动者流动也可以被部分地看做是全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从1978年到1997年,年均GDP的增长速度为9.2%的一个重要原因(蔡昉,2001)。通过起早贪黑劳动、高储蓄、低消费,数千万农村劳动者帮助了其没有外出的家庭成员,也因此帮助了农村本身的发展。如果没有农村劳动者的流动,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会更大。

同时,一个影响更加深远的变化也出现了,农村劳动者流动和城市化既是这个变化的部分原因,也是它的部分结果。这个变化就是,中国社会中许多制度性障碍被清除(或者至少被削弱了),比如城乡间、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农业和工业间的种种制度性障碍。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民推动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农民和地方组织着手建立乡镇企业,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者,这也被看做是农民创造的奇迹。大规模的城乡间的劳动者流动,应该被看成农民对于中国社会基本制度改革的又一个重要贡献。

二、中央政府的政策

2000~2002年,中央政府回顾、总结并调整了对于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的态度和政策。学者们于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各种研究,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学术期刊和媒体上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并展开争论。在这个时期,许多政策开始实施,所有的目标都关注如何拆除中国

国内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藩篱”，对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提供更加公平的待遇。下面，我们将讨论这些政策和措施的重要意义。

（一）户籍制度改革

在浙江等省改革经验的基础上，2001年3月中央政府决定在小城镇改革户籍制度，决定要停止对于暂住证收费，废除对居留时间的限制。同年，国家发改委制定了新的5年计划，主要目标是在今后5年中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消除对于劳动者流动的限制，并建立就业登记制度以及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从2001年10月1日开始，中国开始在人口不到2万的小城镇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试点。10月开始的户籍制度改革，有关劳动者流动的新政策是：在法律上，小城镇对于任何有工作并且有地方居住的农村劳动者开放；中等城市和省会城市取消了对人数的限制，农村劳动者可以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申请常住居民户口；上海和北京之类的超大城市则实施“敞开大门，提高门槛”的政策。

（二）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就地方政策而言，一直存在着两个互相矛盾的路径。一是输出地的政策多年来一直鼓励“富余劳动力”到其他地方去寻找非农工作和非农就业的机会。另一是输入地的政策首先是为了保证当地居民获得就业机会，从而不得不限制外来农村劳动者从事某些领域的工作。例如，在1994年，上海市开始实施带某种歧视性的政策规定，把工作机会分成了几类：（1）有100种以上的职业，禁止雇用没有上海常住城市居民户口的外来劳动者。（2）其他20~30种工作上海常住人口可以做，外来农村劳动者也可以做。（3）还有一些低报酬且没有多少社会福利和保障的工作则由外来的农村劳动者去从事。这样的政策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改变（Huang, 2000）。

2002年初，国务院下发文件，明确了在户籍制度下如何对待城乡之间劳动者的流动问题。主要内容是：（1）大量农村劳动者涌入城市或者跨省流动，是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结果。（2）这些农村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不是农民的一部分，他们对于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不应该制定限制他们进城务工的不合理的或者歧视性的政策，而应该鼓励他们到城市中来务工。新的政策被总结为：“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

（三）确保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得到公平的待遇

2002年9月，中央政府再次强调为农村外出劳动者提供公平环境的重要性，其主要内容包括：（1）雇用农村外出劳动者的企业必须与他们签订正式合同。（2）不允许拖延给农村外出务工劳动者发工资的时间。（3）不允许收任何种类的不合理费用。（4）对于那些临时或者季节性到城市打工的农村劳动者，他们的土地不可以被收回或挪作他用。

200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文件第一次详细说明了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可能会遇到的主要问题：（1）对于他们就业的一些不合理的限制。（2）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的权利和利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3）严重拖欠工资和非法收取各种费用。并重申了以前文件中的一些要点，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非农领域和城市地区，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键；增加农民的收入；帮助重建农村经济；加快城市化的步伐，促进城市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文件再次强调了“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四句话。

更具体地说，该文件包括以下内容：（1）废除任何限制农村劳动者在城镇寻找工作或者临时性工作的不公平限制，比如在应聘的时候，所有的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都应该得到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不应该征收额外的费用，不应该用任何行政手段强迫把他们送回家。（2）确保法律程序的实施，包括和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签订合同，及时发工资，不找任何理由拖延或者克扣工资。（3）改善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特别是农村外出务工的女性劳动

者,包括她们的健康、卫生和安全。(4)为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提供技术和法律培训,这些培训必须以自愿为基础,不能征收任何不合理的费用。(5)为他们的子女受教育安排不同的渠道,使其子女在教育上所获得的待遇和城市居民的子女不应有差异。(6)加强适当的管理,包括计划生育、就业、卫生和法律援助。

尽管最近中央政府的文件立意明确,但在城乡劳动者流动的问题上仍存在着一个政策空当。政府现在的扶贫项目主要是为两类贫困人口设计的:一是大约3000万生活标准低于国家贫困线的农村居民;二是拥有城市户口的贫困人口,他们或是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或是低保的对象,或是又老又病,这部分贫困人口总数大约2000多万^①。然而针对这两类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彼此之间缺乏关联,由扶贫办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分别进行^②。由于彼此间缺乏联系,造成了许多资源的浪费。更有甚者,扶贫办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主要关心的是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而不太注意其他形式的剥夺和劣势。

城乡劳动者流动的适当性,只能够在中国整体的发展战略中来把握。我们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更完整的发展战略,其中的一个关键目标,就是建设能够自主运行和自我管理的小康乡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农村劳动者的流动完全可以发挥出更重要的正面积作用。

三、“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在中国已存在很长时间,但只有农村经济(特别是粮食产量)被当成一大问题。多少年来人们想尽办法去提高粮食的单产和总产量,直到现在,保证中国粮食的自给自足仍然是自从1949年以来历届政府成功治理整个社会的关键之一。

农村居民和农户收入偏低,县政府和乡镇政府还不得不向农户征收更多的税费,即使如此,基层政府却常常无法维持正常的公共秩序,如无法支付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灌溉和农村地区的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费用。

主流的研究建议的解决办法,是要千方百计为乡村的居民找到离开农村的方法去城市求发展,相应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这些研究大多认为,只要加快城市化(主要被理解为城市人口的比重)的速度,农村剩余劳动者就会获得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三农”问题就会有出路(陆学艺,2002)。

不过,这些主张部分是基于对国情(人多地少,农村人多城市人少)的观察,部分则是由对大城市的理念(理想)所推动的,这种理念(理想)认为大城市才是通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许多研究者苦于中国多年来城镇化滞后,因而为大城市呼吁,却还没有来得及对通过以大城市为中心走向未来的可能的替代途径进行必要的探讨。城市化,特别是超大城市的扩展,几乎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它以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以及近年谈论更多的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为特征。

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有关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的政策甚至也要考虑如何逐步市场化和商业化。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村不仅被看成是落后的、愚昧的,而且简直就被说成了是一个需要被“彻底消灭”的地方。许多从事农村农民研究的学者都指出,如果从更为技术的层面

① 城市居民中或者被裁员或者被强迫退休的也是“相对贫困人口”,不仅因为他们的收入比以前降低了,而且他们再也无法从单位的福利体系中获益。大部分国有企业无法再全部负担其雇员的医疗和养老金,更不用说那些下岗的。同时,被裁员的工人和领养老金的人,也无法为自己购买医疗保险或者养老保险,虽然后者的设置就是为了替代原来单位提供的公共产品。

② 民政部负责残疾人和被遗弃的儿童。

来说,解决农村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农民。其实,迄今并没有任何人公开提出过要反对减少农民或反对农民非农化(包括进入城镇),但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而在于如何减少农民人数。例如,往哪里减(大城市?小城镇?或者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其他可能),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来减少(立刻或在短时间内就彻底废除城乡壁垒,还是在整个建设小康社会的初级阶段逐渐消除城乡差别,或者,还有可能走出一个城乡一体化或城乡共赢的格局)。

四、失业或不充分就业

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目前已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在未来10~20年发展中应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千方百计解决好就业问题,而不是仅仅关注GDP的增长。因此,早期的发展战略得到了修订,现在已经把就业提到“民生之本”的高度。

为了解决好就业问题,必须理顺以下相互重叠的关系。(1)农村劳动力总量与结构性制约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是劳动力数量上“过剩”,而且更重要的是许多劳动者无法适应市场的新变化,有些没有什么经验和技术,同时有些老的行业整体衰落了,而新兴的行业并不都是劳动密集型的。(2)城市失业者(包括下岗职工)与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现在面临着新的挑战,即与城市的失业者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开始出现了竞争关系,后者的大量出现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所带来的未能预期的后果。(3)现存的大量劳动者与更年轻的一代(新毕业的或者新成长起来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在未来的5~10年里,每年大约有2300万农村劳动者需要到城镇寻找非农工作,但城市工业实际的吸纳能力据估计只有800万~1200万(黄平,2003)。

改革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成功者和失败者,企业私有化、公共领域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过程的社会代价逐渐越来越明显,而且这些代价在整个社会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中国很可能在今后10~20年中,无法同时既为城市失业者创造就业条件,又为数千万农村的“剩余”劳动者创造工作机会。根据温铁军(2000)的看法,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只好继续资本投资和扩张;被迫允许以廉价的工资雇用劳动者,工资甚至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得经过很长一段存在着严重劳工问题的阶段,包括缺乏对于工人的权利、福利和参与管理的权利等哪怕最低水平的保障等。

有些研究者和决策者认为,在全国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为时尚早,他们认为,更为现实的途径是尽可能地提供各种工作(包括“非正规部门”各类工作)机会,甚至是低薪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很低的“零敲碎打”。也有研究者提出,缺乏基本的权利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低效的(景天魁,2002)。

五、土地私有化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学者(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思考土地私有化和大规模农场的问题。在理论上,他们争辩说,通过土地私有化,而不是像目前那样“暂时拥有的使用权”,农民就能根据自己和市场的需要而自由地买卖土地,就能够逐步形成大规模的农场,这既能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又有益于农村的富裕阶层;更有甚者认为土地的这种私有化过程还会成为农村社会法制化和民主化的基础。例如,茅以轼(2003)曾认为原有的所谓“剥削”(一种负面现象)是已经过时了的概念,它是阻止产权私有化的主要原因,现在到了需要抛弃这个概念的时候了。在今后的10~20年中,中国需要就业和发展。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他们认为私有化就是必须的。

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是,由于土地的大规模私有化或规模化经营,农村一定会有更多的劳动者外出务工,他们真的是“剩余”的吗?换句话说,如果为了通过大规模的农场来改进效率提

高生产率而在全中国范围内推行土地私有化,那么数亿农村居民的出路在哪里?温铁军(2000)认为,只要政府无法通过财政体制为 8 亿农民提供他们所需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中国农村就不存在土地大规模私有化的条件。

我们认为,自改革以来,农村居民拥有了一块能够维持其基本生存的土地。这块土地其实是他们的安全保障网,防止出现大量的失地阶层,再加上户籍制度,确保中国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出现大量的城市贫民窟。即使有一天土地将逐步走向更进一步的市场化,亿万普通农民也不是简单地被取代了、消灭了,他们不会沦落到自生自灭的地步,更不至于沦落到无地—无业—无家的陷阱里去。我们认为,劳动者的流动可以在这方面起重要的作用,而不只是像主流思想认为的那样,只需要尽力减少乡村的“剩余人口”。劳动者的流动,也是带来资本、知识等与乡村发生有机联系的有效途径之一。

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开始思考农村发展可供选择的另类路径,包括农村劳动者外出务工对于农村发展的贡献,以及各个地方可能带来的可持续的和更能体现以人为本原则的解决办法的实践,并且公开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熊景明等,2002;袁鹏,2003;张晓山,2002),但缺乏社会学视野,对于农村如何发展、如何处理农村贫困、农村劳动者流动等,缺少以一种更为制度化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性思考。既包括诸如赋权、农村居民的参与和性别平等,也包括类似区域整体发展、打破条块分割、城乡协调与统筹等,都需要被有机地纳入这种整体思考的框架。

六、一些战略思考

(一) 贫困

贫困应该是多维度的,既有经济贫困也有社会贫困,既有绝对贫困也有相对贫困。首先,使用人均收入水平来说明所有的情况并不总是有意义的,因为即使在一个小社区中也存在着分化或贫富差距的情况。其次,仅仅依靠经济指标也会导致认识上的偏差。收入的增加不一定能够增加一个人拥有的权利或获得服务的可能性。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可能比他们在村子里的收入高,但他们几乎得不到社会和法律的保护,另外,他们还肩负着给家人汇款的责任。再次,应用标准的“贫困线”(不论具体定为多少)并不能够准确测量一个社区的贫困程度,例如,虽然有些人的收入远远在贫困线以上,但需要把大部分收入都花在医疗、教育或搬迁上,而且这对于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尤其如此。更重要的是,应该在关于贫困的话语中引入社会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概念,从多个维度对贫困进行理解,至少把一些农村外来务工的劳动者也看做是城市相对贫困的一部分。

(二) 以人为本

现在是考虑以更为实际的方式在农村地区引入以人为本的理念、并在这种背景下来处理劳动者流动的问题的时候了。以人为本的概念和指标,包括绿色 GDP、可持续发展、以社区(而不是个人)为基本单位的发展(比如更强调社区的认同、安全和团结,而不仅是经济或人均收入水平)。监测与评估当地官员和政府部门的工作,如果仅仅依靠经济指标,如每年 GDP 的增长、人均收入、招商引资额、财政收入等,有可能导致不平衡的发展模式的出现,这些应该得到修正或调整。完全可以探索如何在一些现有的系统(比如农业部以农户为基础的观察系统,国家统计局的农户调查系统)之间寻求更有机的联系和分工,并进一步改善监测它们的指标。

(三) 逻辑起点与目标

在进行任何新的探索的时候,应该有几个基本的逻辑起点。首先,任何单用行政办法阻止城乡之间劳动者流动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其次,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所有的(或大多

数的)农村劳动者都能进入大中城市中。因此,更合乎逻辑和实际的可能是,在广大的中间地带寻找非农就业的各种机会^①。

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探索新的发展机制和管理模式,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和学习,最终形成管理劳动者流动的一个更为完整的框架,逐渐形成一个可以自我维系的城镇化模式和更为平衡的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这个模式也要有助于农村社区(包括基层的乡镇)的巩固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不只是推动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发展;同时它也能维护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的权利,使他们无论是在输出地还是输入地,都享有和当地居民类似的基本权利和就业等机会。这个基本的目标又促使我们提出如下具体一些的思考。

尽管呼声很高,实际上立刻并彻底废除户籍制度是不可行的。我们认为,应该用渐进的方式逐步改善这个制度,授予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与永久居民类似的基本权利。在输入地享受当地居民拥有的基本权利,同时,至少保留输出地居民的一部分权利(特别是对土地的权利),这样,能够继续维系他们和家乡的关系,保持他们对于家乡的认同感。至少,如果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和其家属希望的话,允许他们保留在家乡的土地,允许他们(以及其他村民)在合法和合理的情况下转包、转租或者抵押土地,以便筹措资金用于发展小企业、投资教育、向外迁移,或者在其他地方购买住房,但不能强制推行城市化,更不能以“城市化”为名乱占农用地,并因此人为造成大量失地的农村劳动者。

进一步促进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之间的合作,使它们能够共同设置相关的服务机构,共同支付为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提供公共产品所需的资金。这就需要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和其雇主的个人税收体系必须进一步改善,必须建立一个体系,使在输入地和输出地政府间的财政能够共同分担为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提供服务所需的资金。为了维持最低水平的地方政府运转及其服务功能,应该在村庄、乡镇、县、地乃至省之间进行必要的转移支付。

加强法律和行政体系,确保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作为输入地长期居民的权利,包括购买或租赁房屋的权利,获得基本的医疗保健和子女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注意力应该放在这样一个事实上,许多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并没有足够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他们无法和其雇主建立完整和正式的契约关系。因此,这个群体需要特别的法律和政策保护。

促进把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纳入决策机制的形成,也就是说在决策中也能够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在这里,海外华人输出地的经验应该仔细研究,它们可以为协商和参与式结构提供很好的借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与海外华人密切的关系至少可以部分借鉴,使农村外出务工群体无论对输出地还是输入地的事务,都有一定的发言权和参与权。

探索输出地地方政府把外出务工和当地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政策机制。不仅包括为潜在的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提供服务,也包括在当地城镇、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中,征集和充分使用农村外出务工和已经回流的劳动者的资源和丰富经验。

在改革之前,中国农村在性别平等方面有过很大的成就。为了落实新的发展观并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东西部差距以及两性之间的差距,重新思考这些收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防止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两性之间的平等程度却日益降低的可能性。性别平等的指标应该不仅包括具体的报酬,也应该(而且常常是更重要的)包括两性可能获得的机会和权益。

创造一个更加平衡的农村教育体系,不只是提供让农村孩子也能有升学的机会,也给那些

① 这些“中间地带”,既包括小城市和县城,也包括乡镇所在地以及新发展起来的农村比较发达的社区;而所谓“各种机会”,既包括就近的劳动者流动与转移,也包括各类短期的非农活动,如“离土不离乡”型的,或临时性的、季节性的。

留在当地或者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升学的年轻人提供学习的机会,包括给那些想在当地寻找非农就业机会或者到外面务工的年轻人进行各种适时培训的机会。更广义的教育也包括对于地方官员和技术人员的培训,但这种培训必须使他们了解和学习不同类型的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的经验和各种教训。这些官员和技术人员现在关注和遵循的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和工业化社会的发展道路,且大都是只看到其好的一面。真正的培训,必须能够使他们纠正这种片面的观点和误导性的做法,显然,在这类培训内容中,也应该包括发达国家的教训或负面经验,应包括中国本身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经验,也要关注中国农村劳动力输出地的地方政府为了当地发展如何支持城乡之间劳动者流动的经验。

中国政府已经大大增加了科学家、学者、大学教师和中学教师的收入,这是改革以来最主要的变化之一。现在,应该是这些专家和精英考虑如何为基层社区的全面发展做出更多贡献的时候了,特别是在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贫富之间的差距以及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方面做出贡献。大学、学院、学校和研究机构的评估体系也应该加以修正,鼓励高中级知识分子为贫困社区、边缘群体和欠发达地区工作,甚至探索如何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至少有一小部分时间(比如1~2年,或以小时为单位,如一生中拿出2000~3000小时)到这些地方去工作,这当然要以自愿为原则。

七、简短的结论

从数量上说,中国的劳动者流动主要是发生在国内的城乡之间,数以千万的来自乡村的年轻人,或者到附近的镇、县、地区的中心,或者到省会城市以及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寻找非农就业的各种机会。这股潮流至少还要持续20~30年,甚至会发展为数亿人的规模。

从目前来看,城乡之间的劳动者流动,能够为农村居民和社区带来大量的非农的现金收入;从长远来看,这种流动,包括更为永久性的城镇化,将减缓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人多地少的问题。但是,城乡之间的劳动者流动也可能在已经越来越多的城市相对贫困人口中形成一个新的社会下层,并出现农村经济的凋零,农村社区的衰落。

在当今中国,劳动者的流动不可避免地要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这个基本的结构性变革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流动的模式和意义既受到集体时代旧的制度的影响,又受到市场力量的作用。我们认为,这种独特的结构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主要的挑战是促使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即使他们仍然收入偏低、权利有限)能获得更为公平的机遇,同时应该着力避免他们与城市的贫困居民之间的恶性竞争和彼此冲突,而关键的有利于农村或基层的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在于,改善并动员依然运行有效的地方基层(县、乡、村)结构,并继续维系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者和他们家乡之间(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的紧密纽带。

如果中国管理劳动者流动的时候以这些范围更广的目标为战略,那么从长远来看,它将有助于实现一个更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不至于出现许多混乱和不平衡的发展格局,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些混乱和不平衡常常都与大规模的城乡间劳动者流动联系在一起。为了充分发挥城乡之间劳动者流动的正面作用,并避免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我们必须问,这些从农村地区来的劳动者和他们的亲属——孩子、父母或弟弟、妹妹的流动,怎样才能对城市和农村社会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而不只是对城市发展有利,而且,它最终会确实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而不是拉大这个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城乡之间的劳动者流动的速度和规模究竟应该维持在(或增加到)什么样的水平上才合适?

退一万步说,即使将来城乡间的流动完全平稳推进,也获得了彻底成功,也就是说,农村居民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地位和身份,绝大部分都变成了永久性的城镇居民,且即使他们谁都不会

(就如在有的发展中国家那样)落到从无地到无业再到无家的“三无”地步,中国的贫困问题也不会就随之自然而然地解决了。到那个时候,在各个城市,相对贫困人口依然可以是数量不小的,其中既包括那些国营企业的下岗职工,也包括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既包括年老体弱的,也包括刚刚来到城市的农村劳动者。现在,后者虽然报酬微薄,缺乏社会保障和福利,也得不到什么保护,处于社会边缘的位置,但由于有了一点现金收入,他们一般说来还是有相对满足感,然而,当他们的参照系改变了的时候呢?

归根结底,流动并不能完全解决农村存在的一切问题。即使到2030年城市化率达到了50%,仍旧有一半人口在农村。我们即使是完全站在城市人的利益和立场上,还敢说城乡统筹与协调、并最终一体化发展不重要吗?

参考文献:

1. 温铁军(2000):《三农问题的实际反思》,《读书》,第1期。
2. 黄平等(1997):《寻求生存》,云南人民出版社。
3. 蔡昉主编(2001):《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 陆学艺(2002):《农民与农村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 黄平(2003):《发展不能超越的底线》,《视界》,第8期。
6. 景天魁(2002):《中国社会保障的理念基础》,《社会政策评论》,第4期。
7. 茅以軫(2003):《改革的动力在党内》,《改革内参》,第11期。
8. 熊景明等(2002):《错位:农民需求问题》,《开放时代》,第2期。
9. 袁鹏(2003):《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研究信息》,第1期。
10. 张晓山(2002):《联结农户与市场——中国农民中介组织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1. Bai, N. (2001), The Effect of Labor Migration on Agriculture: An Empirical Study, *Rural Labor Flow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2. Huang, P. (2000), When Young Farmers Leave the Farm: What Will Happen to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When Rural-urban Migration Takes Place at a High Pace under Impacts of Globalisation? In: Lindqvist, C. ed. *Glob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Stockholm: FRN, pp. 56-67.

(责任编辑:朱萍)

广告征集

为了促进学术交流,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中国人口科学》继续在封二、封三和封四上刊登各大院校系、研究所和计生委简介,以及课题和图书介绍。收费标准视版面和内容要求而定。单位或个人若有这方面的意向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联系电话:(010)85195419

传 真:(010)65125889 或 65125894

电子信箱:zazhi@cass.org.cn

ABSTRACT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Sex Ratio Imbalance at Birth and Strict Population Control

Ma Yingtong • 2 •

China's past lessons from population control and the sex ratio imbalance at birth have exposed problems in the country's demographic research and decision-making of population policies. This paper makes a thorough analysis on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ose problems and clarifies the disagreements on population control and sex ratio at birth.

Boy Preference and Induced Abortion in Rural China: Findings from the 2001 Survey

Wei Yan Li Shuzhuo Marcus W. Feldman • 12 •

Using data from the 2001 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Surve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y preference and induced abortion in rural China during periods with different birth control policies. The paper finds that temporal trends, features and patterns of variation in induced abortion and sex ratio at birth are fundamentally consistent. Among women with only two children, the risk of having an induced abortion to end the next pregnancy for those whose first child is a daughter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or those whose first child is a son. These results reveal that sex-selective abortion is widely prevalent, that boy preference i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induced abortion, and that sex-selective abortio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ise of sex ratio at birth in rural China.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Social Integration: A Survey in Aba Autonomous Prefecture, Sichuan Province

Zhu Ling • 22 •

It is known that the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increased to high levels during the marketization process in Aba Autonomous Prefecture populated by Tibetan and Qiang ethnic groups in Rural Sichuan Province. The phenomena of "ecological poverty", "health poverty" and "educational poverty" are co-existing in the rural areas in Aba. Because the provision of basic health care services is insecure and educational threshold for non-agricultural jobs has been growing,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poor tends to become long-term and irreversible. In order to change the present situ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food assistance should be continuously provided to the hard-core poor groups. Furthermore,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human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promotion in the policie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Huang Ping Frank N. Pieke • 33 •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research on rural-urban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ought take consideration more seriously of the contribution that migration mak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igin of migrants. At the national level China has drafted a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that includes the creation of a viable and prosperous countryside as one of its key objectives. To achieve this objective, labor migration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What seems to be developing is a broader social perspective, and sensitive to the more institutional links between rural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tion and labor migration, especially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empowerment of rural people.

Features of Urbanization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Wang Guixin et al. • 42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ization progress, scale-space structur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system, migr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phas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ompared with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c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main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of this area should be given priority in national strategy.